

理想
藏书

典藏经典



□君玉离 木尹 编著

读史有学问 下



内容全面 文字精练 图片丰富

揭秘历史档案 再现历史现场 还原历史真相



历史不忍细看

大全集

从小细节看出历史真学问
于精深处读出人生大智慧

触摸文明脉搏
开阔文化视野

历史由诸多细节构成，每一处细节虽然不能代表全部历史，却可最真实地反映历史。只有通过构筑细节，才能更加形象地勾勒出历史的现场气氛，从而更好地探索历史的学问。本书从细微之处入手，搜寻历史的蛛丝马迹，用轻松活泼的文字来反映点滴历史，力求见微知著，去伪存真。

中国华侨出版社

钩心斗角

钩心斗角的权位斗争



尧舜禹禅让的历史真相

中国古代中所谓的“禅让”制度，类似于现在的投票选举，呼声最高的候选人将接任大权，成为下一任的领导者。这与血统和身份无关，是一种和平转让权力的方法。

《庄子·杂篇》中说：“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这里说的“相禅”就是替代的含义。权力的和平转移以尧、舜、禹最为美谈，千古以来，人们提及这三位君主都称颂不已，他们成为了“托古改制”的原始依据，但事实上并不是儒士口中所传承的那样。

在史书上有所记载：《尚书》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这样写道，尧在位70年后，其子丹朱不成器，不得百姓爱戴，作为驸马的舜那时已然摄政，但仍保荐丹朱治理南河8年。直到朝臣和百姓认为丹朱不是治国之才，纷纷靠拢“贤明”的舜，让尧也了解到他的儿子朽木不可雕，舜才以一句“天也”结束了丹朱的政治生涯，坐上了帝位。这样看来，似乎并不是尧让位，而是舜自己取代了丹朱。所以，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有这样的评语：“舜逼尧，禹逼舜。”尧不得不传位给舜，实乃舜已经完全得到百姓的爱戴，近百岁的尧又能如何呢？

《尚书》中还有言：尧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服。

舜即位后，立刻除去了共工、终、鲧、驩兜等一千尧在位时的名臣，终使天下臣服。很显然，共工等人很可能威胁到舜的顺利即位，所以他才如此排斥他们。此招“杀鸡儆猴”再明显不过。不过舜到最后也是胆战心惊地坐着帝位，因为即将取代他在人民心中地位的人，正是鲧之子禹。



尧舜禅位图

舜是禹的杀父仇人，此乃毋庸置疑的事情，所以禹治水成功后，能甘心为舜所用吗？此时再看韩非子的“禹逼舜”这句话，顿觉其中的精到之处。虽然《史记》上讲，舜南巡不幸病死途中。但战国时魏国史书《竹书纪年》却这样记载：舜年迈体衰，禹于是迫舜去南方巡查，实为“放逐”，舜因此死于途中，两个妃子娥皇、女英都不在身边。舜死得如此孤独，于是便有了晋代张华《博物志》中记载的凄惨结局：“尧之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帝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

不管是《史记》的记载更符合真实历史，还是被称为“野史”的《竹书纪年》更贴近现实境况，总之，舜的死实则是蹊跷的。今日无论如何推测，都不可能再现当时

的情景，又如何知道舜传禹帝位是否有内幕的存在？

其实，原始社会除了尧、舜、禹三人是以“禅让”名目传帝位之外，在之前“禅让”根本就不曾存在。从轩辕黄帝开始一直遵循着子承父位的规矩，黄帝王朝子孙相传共传了七君。

孔子翻遍了历史，才找到尧、舜、禹三人并非子承父业的例子，于是以“天下德者居之”教育子弟，到各国游说各色君主，提倡礼乐、道统。而事实上，孔子及其弟子用了2000多年的时间，实践的一直都是希冀将君主化为圣人的治国政统，而非将圣人化为君主的治国道统。儒家的道德理想，从始至终都为君主所利用。

禅让在儒家的道统中是上古圣贤明智的象征，是最正确的政治的举措。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这无疑是道统凌驾于政统的标志。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此乃孔子一生笃信的圣人治国策略、追寻的道德理想，就连吕不韦也曾以此言暗示秦始皇的暴政即将倒台。

于是有人认为，政道合一、儒家道德规范成为政治手段，才是永久的统治之道，但可惜古老的禅让和德治还是不幸地破灭了。

是谁剥开了“禅让”的谎言？我们或可从魏文帝曹丕的身上得知一二。曹丕心安理得地接受傀儡汉献帝禅让帝位之后，脱口而言：“舜禹受禅，我今方知。”一句话揭露了古代“禅让”背后的实质，在曹丕看来：原来天下唯“德者”居之，实则应该改为天下唯“权者”居之，谁的实力足够强，谁的地位足够稳，谁就可登上帝位。曹丕度古人之腹，虽有偏颇，但未必不是空穴来风。

看天下千百年斗争，越是乱世，“禅让”的戏目上演得便越精彩，在“和平性异姓夺嫡”的光环下，这些“禅让”的神话怪圈有许多是被历史和人们理想化了的政治谎言。

周公为何没有取代周成王

说起周公，似乎总与“解梦”纠缠不清。然而周公生平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执政6年后让位于成王，实现权力的和平过渡。于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当危难过后便毅然让位，周公这种无畏无私的精神，受万代称颂，同时也引发了后人对其让位之举的质疑。

有人指出，《荀子·儒效》和《淮南子·记论训》中都说周公想要夺取天下。《礼记·明堂位》和《韩诗外传》卷三也有记载周公想要坐上天子的位置。《尚书·大传》更明确指出，周公身居要位，管理着天下的国事。

又有人考证说，《尚书·大诰》中出现的“王”，把周文王称为“宁王”，也称作“宁考”。而“考”是对已故父亲的称呼，所以这个“王”应是周公。《尚书·唐诰》中也有记载：“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周公的弟弟康叔，名“封”，《康诰》中的“王”称康叔为“弟”，显然这个“王”也是周公。如此说来，周公的确自称为“王”。

根据以上证据，便有人认为，周公在武王去世而成王年纪尚幼之时，便有谋权的意图。之后以“王”之名义，行“王”之权力，虽说东征西伐、治国安邦功不可没，但也不能掩盖其意欲以权夺位的野心。

至于周公最后没有取代成王，实乃应形势的无奈之举。因为遭到当时地位举足轻重的召公、太公的怀疑，而成王也对周公起了疑心，并且周公的两个兄弟管叔、蔡叔又与纣王之子武庚联合起兵，关中局势动荡不安，形势对周公极为不利，周公不得不还政于成王，以平

息众怒。

此番质疑，对世人心目中周公那无畏无私的形象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更多的人仍坚持认为，从周公临危受命而勤勉摄政之举，从他在武王病危之时愿意以身代死的决心，便可看出周公对国对君的一片赤诚之心。如此忠君爱国之人，绝不可能做出僭越夺位之事。

无论是无奈还政，还是真心让位，不过是后人充满感情色彩的想象。而周公心中所想，早已随他而去，深埋黄土之中。

秦赵渑池会幕后的权利角逐

战国争霸的硝烟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经过太史公的妙笔渲染，七国争雄的历史早已深入人心。秦赵渑池之会的故事也是家喻户晓，千古流传。渑池会树立了蔺相如不畏强秦、力挽狂澜的高大形象。但是，仅凭蔺相如一人之力、口舌机智就能如此简单地战胜秦国吗？事情并非这样简单。渑池会也只是秦赵之间共同利益的双赢结果，这与战国时复杂的形势密不可分。

公元前 279 年，战国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东方强国赵国和西方强国秦国相争，死伤无数。楚、齐则趁机崛起。为了遏制楚、齐的力量，秦昭王约赵惠文王在渑池相会。秦国君臣曾欲欺辱赵惠文王，赵方以蔺相如为首毫不示弱，处处反击。最后双方达成共识，秦、赵之间停止战争。

在渑池会 5 年之前，即公元前 284 年，战国形势又是另一片情景。东方强国齐国与西方强国秦国争霸，实力不相上下。秦国联合六国共抗齐国，齐国在六国的合攻之下一败涂地。秦国唯一的对手消失之后，成为战国七雄之首。秦国灭齐的目的达到后，他与其他五国之间的盟约也正式结束，双方又站在了敌对的位置之上。秦国攻占了魏国之东的一大块地盘，并长驱直下，阻断了燕、赵与楚、魏、韩之间的联系，这是秦国为统一天下走出的第一步。

赵国经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之后，成为东方继齐之后的第二强国。在东方强国齐国衰败之后，处于东方的第二个强国赵国逐渐强大起来。赵国在东方取得本属于齐的富庶之地——河间，经济实力大增。加上赵惠文王的经营，任用一代名将廉颇，名相蔺相如，使得赵国的政治实力更为增强。强大的军事实力、政治实力、经济实力，使赵国成长为东方大国，也成为秦国最强劲的对手。

公元前 283 年，秦国为了实现一统天下的愿望，作出了第二步措施：攻打魏国，直取魏都大梁。燕、赵两国出兵 20 万援救魏国。秦国无奈之下只能放弃攻打魏国。这一事件让秦、赵之间的矛盾尖锐化，秦、赵敌对的形势逐渐形成。

秦国为了攻打赵国，与楚、魏、韩联盟，对赵国形成了包围之势。孤立的赵国只剩下燕国一个盟友。然而赵国并没有意识到形势的急剧变化，依然连年伐魏，这给了秦国攻打赵国西境一个可乘之机，秦将白起攻取了蔺、祈、石和光狼等城。面对如此形势，赵国被迫停止对魏的进攻，集中兵力对付秦国。直到公元前 279 年，4 年内，秦、赵之间连连征战，双都势均力敌，一直未分出胜负。

在这 4 年之间，衰退的齐国又奇迹般地复活。以田单为首的齐军打败了燕军主力，收复了齐国的大量失地，齐国席卷之势给赵国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同时，与秦有盟约的楚国也趁着秦赵胶着之际逐渐壮大，率军反攻秦国，打入秦的巴郡地区，攻取了旧巴国的都城枳，秦国的后方基地巴蜀地区面临着丧失的危险。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势均力敌的秦、赵之间如果开战，必然受到楚、齐的威胁，这对秦、赵双方来讲毫无益处。秦、赵两国基于实力基本平衡、拥有共同利益的前提之下，于公元前 279 年在澠池相会，秦、赵罢战讲和。随后，赵军集中力量攻打齐国，秦军集中主力攻打楚国，齐、楚两国的复兴美梦在秦、赵的铁拳痛击下破灭了。

因此，秦赵两国澠池会，实质上是一场强国与强国之间的外交会晤，是两大强国在实力基本平衡之下的一次战略妥协。两国共同面对的国际形势，使得两国能够达成默契，也只有建立起彼此间较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才能够转移主力粉碎齐、楚的复兴企图。所以，形势已经决定了秦赵两国必须化干戈为玉帛。

秦赵破楚齐之后，秦赵双方又开始了敌对的状态，两国争霸重新开始。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澠池会只是秦赵两国基于外交形势所作的暂时妥协。

巫蛊引起的宫廷血案

西汉巫蛊连环案，诱因是汉武帝沉迷黄老巫蛊之术，引发了妃嫔之间的斗争。但其实质并非简单的后宫纷争，而是整个朝廷势力的斗争，最终引发了“太子谋反”的惊天大冤案，导致汉武帝晚年妻离子散、众叛亲离，在后悔与沉痛中死去。

作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汉武帝大半生所行功德可抵黷武之过，然而一个小小的巫蛊之术却令武帝千古功名蒙上了一层阴影。难道巫蛊之术竟可怕如斯吗？其实真正可怕的应当是人心才对。

巫蛊连环案的事情起因源于汉武帝的一场幻觉。征和元年（公元前 92 年）三月，赵敬肃王彭祖去世，夏季又逢大旱，宫外尚未安定下来，内宫就出现了妃嫔以巫蛊互相攻击的事件。本来妃嫔用巫蛊之术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当时武帝也未放在心上，哪知妃嫔们的斗争愈演愈烈，最后竟互相诬陷对方用巫术诅咒皇上。汉武帝见状很是不满，一怒之下处死了大量宫人和一些外戚臣子。但他总是梦见有人在用木人诅咒自己，一时间寝食难安。有一天，他正坐在建章宫内养神，恍惚看到有一个男子带剑走进中龙华门，本来应该有重兵把守的中龙华门却没有一个人出来阻止。

汉武帝心道那男子莫非是来刺杀自己的不成？于是大声叫喊，哪知男子扔下剑隐遁而去。吓出一身冷汗的汉武帝大叫侍卫护驾，并派人到皇宫内翻查，却一无所获。其实汉武帝一生杀人很多，很可能是因为心理原因产生了有人欲找自己报仇的幻觉。但彻查的结果令他很失望，刺客没有找到，反而在后宫和京城各百姓家中翻出大量的木偶和咒符。汉武帝因此认为有人用巫术制造神魔来刺杀他，于是下令严查此事。“巫蛊案”就这样掀开帷幕。

君主身边最不缺乏的就是小人，“巫蛊案”本来可以很快过去，但是有人却诬告当朝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施用巫蛊之术诅咒皇帝。公孙贺的夫人君孺是皇后卫子夫的姐姐，所以汉武帝与公孙贺关系素来亲密，公孙敬声也因父亲的关系担任太仆一职，负责掌管皇帝的舆马和马政。可是偏偏公孙敬声不争气，骄奢淫逸，贪财好色，收受贿赂，结果被关了起来，公孙贺于是抓了所谓的阳陵大侠朱安世，想要借此立功，帮儿子将功赎罪。

朱安世自然不能坐以待毙，就托人上书汉武帝，称公孙敬声和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并派遣巫师在天子所驰的马路上埋木偶人诅咒天子。朱安世这一告发有理有据，汉武帝立刻相信，就逮捕了公孙贺一家，把他们交给了当时的著名酷吏杜周查办。杜周公报私仇，不但杀了公孙贺父子，还将阳石公主和与本案没有什么关系的诸邑公主一起杀了，只因诸邑公主与卫子夫弟弟卫青之子卫伉是表亲，而卫伉与杜周结了怨。

虽然死了一群人，但汉武帝老来多疑，认为还是有人想要害自己，于是将“巫蛊案”交给了自己的宠臣江充查办。江充靠裙带关系取信汉武帝，他的“公正无私”是故意装出来的，但汉武帝却相当放心地将巫蛊案交由他来查办。在调查此案的过程里，江充完全将个人恩怨融入其中。在朝廷中，他最想扳倒的人就是太子刘据，因为他曾经抓了刘据的亲信，刘据向江充百般求情，江充却一意孤行，因此得罪了刘据。其实刘据对于此事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他也不是记仇的人，但江充却不这样认为，只想着借巫蛊案诬陷太子和皇后卫子夫。不过汉武帝对刘据疼爱至极，江充几次都没有成功陷害刘据，倒是刘据看出江充的歹心，一怒之下发动政变杀了江充一干人等。

已经深居简出、在长安城外甘泉宫养生的汉武帝不明就里，只知道太子杀了自己的近臣。恰在此时有人在汉武帝耳边不断吹风，说太子想要谋反。一开始汉武帝并不相信，便派了侍从去长安城探听情况。侍从到城外转了一圈，发现守备森严，没敢进城，转身便跑回甘泉宫禀告汉武帝，太子的的确确是造反了。或许是刘据倒霉，也可以说是汉武帝昏聩，就这样听信了小人之言，相信自己的儿子有谋反之心，于是向丞相刘屈氂发布敕令：立即发兵出击，对造反者一律杀无赦。刘屈氂本来无心害太子，无奈天子之命不能违抗，便派兵攻打长安城。

刘据本没有造反之心，所以根本没有重兵抵抗宰相的军队，只得发动百姓死守长安。但百姓只知道“太子造反”之事大逆不道，所以刘据大失人心，最后兵败如山倒，逃离了长安，没过多久便被找到，而那时的刘据已经自缢而死，其母卫子夫早在他之前已经上吊自尽。

一年以后，汉武帝才查清楚原来是奸臣搞鬼，害死了自己的皇后和太子，除了为太子平反、追封刘据，再没有什么能够挽回。

小小的一桩巫蛊案，在皇帝的疑神疑鬼和小人的借机发挥下，使汉王朝的宫廷内外掀起了长达数年的血雨腥风，到头来只让人心生悲凉。

曹操不敢受帝号的真正原因

一代枭雄曹操，出身卑微却胸怀大志，凭借对权谋与智慧的妙用，在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中崛起。到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献帝至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依靠如此优势，枭雄奋起，统一了黄河流域，官拜丞相，封魏王，成就宏图霸业，开创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曾被认为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在其“知天命”之年达到了权力的巅峰。然而，他最终没有承接“天命”登上帝位，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

尝试解开谜题者，历代都有，述其主要原因如下：

1. 背不起乱臣贼子的骂名

东汉末年，汉室衰微而天下大乱，但纲常伦理、忠孝礼义仍在。曹操虽有雄才大略，亦

摆脱不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争权夺利、内征外战的血雨腥风中，一直以天子之名出师，以捍卫朝廷的名义进行战争。曹操深知，如果自己废献帝，登帝位，那他将沦为千夫所指的罪人，难逃今生来世历朝万代的唾弃与责骂。这是一代枭雄背负不起的重担，曹操也不例外。他一再表明自己绝无称帝之心，绝不是篡权夺位的“奸佞小人”，而是忠心辅政的“贤能将相”。足见其受儒家正统文化影响之深，断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背负乱臣贼子的骂名。

2. 经不住群起而攻之的激战

虽然曹操已取得了对汉室中央的绝对控制权，但他的势力仍局限于北方，东南的孙权、西南的刘备亦非等闲之辈。曹操如果贸然称帝，必将成为众矢之的，让孙权、刘备等人有了一个讨伐乱臣贼子的幌子，继而带领天下英雄群起而攻之。如此一来，他苦心经营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绝对优势如流水东去，难挽狂澜，不仅陷入政治和道德上的被动，更有可能引发一场空前惨烈的激战。任其再怎么兵精将广，一旦以乱臣贼子的身份与天下豪杰对抗，胜算可想而知，更难逃“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下场。面对如此不利的形势，心思缜密的曹操又岂会为了一时的痛快而陷自己于万劫不复之地？

3. 看不上虚名而重实权

曹操为人讲求实际，实权与虚名孰重孰轻他再清楚不过。能够从乱世中一路走来，靠的不只是雄心壮志，更是因为他比较重实权。称帝不过是多得了个名号，而天子诏令由他口授，朝廷政策由他制定，官员任命由他授意，这一切足以证明他名为丞相实当皇帝。皇帝名号，此时不仅不能锦上添花，反而可能因此而遭罪，要它何用？

一句“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似乎道出了枭雄的心愿，点破了曹操宁为儿子铺路也不愿自己称帝的决心。然其心中真实的想法，历千年涤荡仍扑朔迷离，但凭后人评述。



魏武帝曹操像

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曹操是个反面人物。实际上，曹操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统一北方，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对于结束东汉末年的战乱功不可没。同时，曹操在文学上也卓有建树。

杀光百名侄子的冷血皇帝

谈起十六国那段历史，北燕当属重点。慕容家统治北燕，一直到慕容云时期，发生了变故。慕容云原姓高，虽然他当了皇帝，但他自认为自己并非是鲜卑人，内心十分自卑。为了收买人心，让大臣们都对他服气，他便天天大开府库，赏赐文武百官。

其中大臣冯跋是慕容云的拥立者，但慕容云却对他心怀戒备，为了防止自己被刺杀，慕容云在身边养了一帮武士，吃睡都与这些武士在一起。可没想到，武士中有两个名叫离班、桃仁的人为了谋求皇位，将慕容云刺杀了。

慕容云被杀后，冯跋带领卫兵，将离班、桃仁立斩于殿前。而冯跋为众人所推，成为继任慕容云皇位的人选。从他开始，北燕便改姓冯了，开始了由冯家统治的时期。冯跋继位

后，依然没有得到安宁，他的堂兄冯万泥、冯乳陈叔任两人不服，想要夺取皇位，幸好冯跋的二弟冯弘率兵镇压了下去。

冯跋看到冯弘功劳甚大，便任冯弘为骠骑大将军，晋封中山公。冯弘的权力从此与日俱增。冯跋在位 22 年间，国泰民安，他轻徭薄赋，崇尚儒学，很是为国家做了一些好事情，让那个乱世呈现出了少有的安宁。

但是公元 430 年秋，冯跋病危之时，争夺君主之位的战争再次上演，冯跋宠妃宋氏为了立自己的儿子为君主便想谋反，而这件事情被冯弘得知，他率领卫兵冲入皇宫之中，囚禁了宋氏母子，控制了大局，而病重的冯跋便在一片慌乱之中惊吓而亡。

冯跋死后，冯弘自立为天王，废杀太子冯翼。他不念旧情，为绝后患，将冯跋的 100 多个儿子通通杀光。无论是十几岁的少年，还是刚刚出生的婴孩，冯弘都一个不留。自古篡位嗜杀前任后人的君主不在少数，冯弘却斩草除根，一个不留，也的确是历史上罕见的血腥帝王。

杀掉所有冯跋的后人后，冯弘便霸占了冯跋貌美的妃子，此举令他在继位的时候便失掉了人心。众叛亲离之下，冯弘的几个儿子为了不被自己的父亲杀掉纷纷逃亡北魏。而当时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焘便乘机发兵，想要一举歼灭北燕。

战争开始以后，冯弘连连败退，为求自保，他不得不向南朝宋文帝求援，遣使称藩。有利益可得，宋文帝当然愿意帮忙，他封冯弘为“黄龙国主”，并答应出兵助北燕。但因为南朝距离北燕路途遥远，远水解不了近渴，北魏很快将北燕的城池攻破，冯弘流亡到高句丽。

从高高在上的君主沦落到寄人篱下的下场，冯弘的日子并不好过，后来冯弘又求助于宋文帝，求宋文帝将他接走。得知此事的高句丽王勃然大怒，当即下令诛杀了冯弘全家。

沦落如此下场，冯弘是咎由自取。

唐太宗为何要修改国史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皇帝。在位期间，他勤于政事，举贤任能，体恤百姓，减轻刑罚，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因此，在后人眼中，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中国历代帝王的表率。但即使是这样一位英明圣主，他的一生仍有很多瑕疵，“玄武门兵变”的历史实情一直让后人迷惑，而他后来修改国史的行为也让人议论纷纷。

贞观三年（公元 629 年），太宗下令在中书省特别设置秘书内省，专门负责修撰前五代史。但是同年闰十二月，太宗又下令将史馆移入禁中，设于门下内省北面，由宰相监修。从此之后，史馆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门下省的一个常设机构。唐太宗究竟出于何种动机要重置史馆，修改国史呢？这个问题迄今为止仍未有确定的答案，给历史留下了一桩疑案。后人对此持有不同观点。

一种说法认为唐太宗修改国史，是为自己杀兄逼父篡位辩护。这种观点认为，李世民的皇位并不是合法继承而来，是其弑兄逼父的结果。这一行为并不符合封建法统和封建伦理，在李世民自己看来，也是不能贻子孙、垂为法诫的。所以，为掩盖这种残暴的行为，也为了确立他登基的合法性，李世民决定撰修国史，下令创立了宰相监修国史的制度，这就使史官很难做到秉笔直书，只能按统治者的意图撰写历史。

李世民在位期间，曾不止一次违例要求亲看国史和起居注，并称是“使得自修改耳”。

其实，作为帝王原本就是不可以随便看史官写的起居注的。在李世民授意下，史官们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动因写成“安社稷，利万民”的大义行为，从而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史官费尽笔墨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李建成的成绩，降低高祖李渊的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谋描绘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样，李世民便成为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给人造成皇位本属于他的印象，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如此一来，李世民登上皇位便显得合理多了。

还有种说法认为李世民之所以要修改国史，抬高自己在太原起兵中的地位，贬低李渊的功劳，乃是出于当时政治统治的需要。他要求贞观史臣把太原起兵中李渊由主动起兵变为被动起兵，目的是为了把李渊描绘成一个隋朝忠臣的形象，从而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李世民将李渊描绘成是在隋炀帝要下令逮捕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不得不反的形象，而且在起兵时李渊还曾号称“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这样一来，李渊就成了大忠臣了。很明显，这种刻画有利于维护李世民的统治，防止人们以此为例，起兵谋反。

以上说法多是各家的推测，并没有明确的史料依据。李世民继位后修改国史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是他为何要修改国史，其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判断了。

房玄龄为什么能 20 年稳居相位

房玄龄，大唐开国名相，对唐朝初年“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可说是居功至伟，无人能及。虽经历宦海浮沉，三起三落，仍能稳居相位，后世流芳。其中的秘诀，耐人寻味。

自幼聪敏好学的房玄龄，博学多才不在话下，更难得的是他天生有敏锐的政治触觉。在秦王李世民还只是个年近弱冠的血气男儿时，房玄龄就察觉到其天命所在。当时，李渊父子起兵不过短短两个月，一切都还是未知之数，而房玄龄就认定了隋朝将亡、李家王朝会取而代之，于是毅然“杖策谒于军门”，投奔李世民。

房玄龄老成持重，目光长远。每次出征得胜，其他将领争先恐后地抢夺珍玩宝物，唯房玄龄忧心于为李世民招揽人才，收集各地图书典籍，以备有朝一日治国之用。房玄龄的做法间接为李世民树立了求贤若渴的高大形象，在争取民心的斗争中把握先机。他的远见卓识，令李世民叹服。

房玄龄在“玄武门之变”的皇位斗争中，充当了李世民重要的谋士角色。当时李世民虽为次子，但因战功显赫，加号“天策上将”，位于一切王公之上。太子李建成对此心生疑忌，认定李世民会威胁到他继承皇位，便与四弟李元吉联合，妄图置李世民于死地。房玄龄力荐李世民效法周公，除掉李建成及其同党，这样才能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确保国家社稷的安定与昌盛。房玄龄与李世民一拍即合，使他成为推动李世民发动宫廷政变的重要人物，从而也奠定了他在秦王登基之后的特殊地位。

李世民即位后，任命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在 22 年的宰相生涯中，房玄龄忠心耿耿，为贞观之治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甚至肯屈尊兼做“度支郎中”，亲力亲为地打理财政预算和账目。他的忙碌让李世民都难以承受，曾当面劝他不要总把自己弄得太疲惫。可房玄龄依旧如故，不为所动。

房玄龄深知“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在李世民授予他“太子少师”的职衔时，他上表请求解除机要职务，退出权力中枢。李世民不仅不批准，还下诏命令他不得继续上表就同一问题再次请求。当太子准备仪仗队要正式拜见老师的时候，房玄龄始终没敢接受如此礼遇。房玄龄纵使身居相位，仍谦恭礼让，谨慎维持君臣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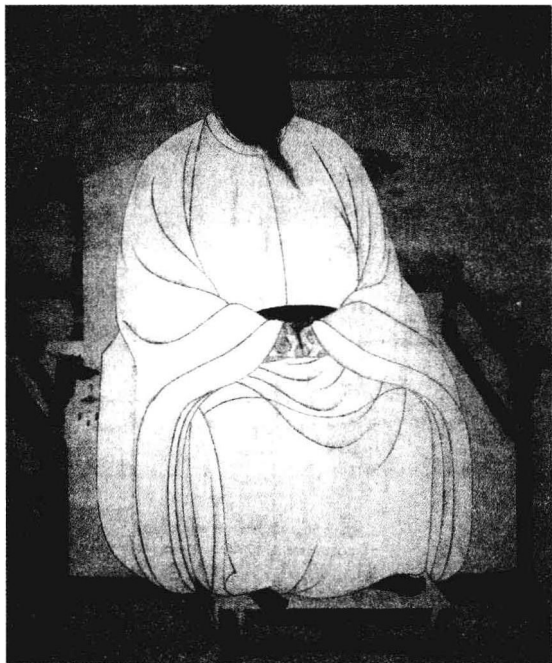
房玄龄是名副其实的“宰相肚里能撑船”，其宽大的胸襟足以令同朝为官者拜服。有一次他重病在床，奄奄一息。一个特别尖酸刻薄的官员居然说：“一个人应该分得清轻重缓急，譬如宰相生病这件事，在我看来就很有区别对待的必要。一般情况下，如果房玄龄生的是小病，我们绝对应该前去看望，因为这样可以加深和宰相的感情，以后，宰相也会给我们点恩惠。如果宰相病得严重了，那就另当别论。因为一旦宰相病死了，你去看望他所付出的就永远没有收回来的可能了。”房玄龄知道后，不但没有大发雷霆还以颜色，还在那人来探望之时面带笑容地对他说：“谢天谢地，我知道我自己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了，因为你都来看我了！”

“孜孜为国，知无不为”，道出了房玄龄的为官之道；“虚怀若谷，德才兼备”，更彰显一朝盛世的名相风范。

杜太后真与宋太祖订过“金匱之盟”吗

宋太祖赵匡胤驾崩后，皇位由其弟赵光义继承，正史认为赵光义乃合法继位，是奉太后“金匱遗诏”之命行事。但后来有人对“金匱之盟”一事提出质疑，使得这一事件变得扑朔迷离。

《宋史》有好几处提到“金匱之盟”事，《杜太后传》里面记叙：“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太后病，太祖始终在旁服侍不离左右。太后自知命已不长，召宰相赵普入宫。太后问太祖：‘你知道怎样得天下的吗？’太祖曰：‘我所以得天下者，皆祖先及太后之积庆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儿统治天下耳。假如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所拥有乎？汝死后当传位于汝弟。四海至广，能立长君，国家之福也。’太祖顿首泣道：‘敢不如教诲！’太后转过身对赵普说：‘尔同记吾言，不可违背也。’赵普于床前写成誓书，普于纸尾写‘臣普书’。藏在金匱（同柜），命谨慎小心的宫人掌之。”



宋太祖赵匡胤像

在司马光《涑水纪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著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历史上人们虽然相信有所谓的“金匱之盟”，但却找不到盟约的原文。1000多年来，

没有人怀疑“金匱之盟”的真实性，这一盟约就成了宋太祖坦荡无私的例证。直到清代，古文学家恽敬对盟约内容提出疑问。

20世纪40年代初张荫麟曾作《宋太宗继统考实》，后收入《张荫麟先生文集》，认为“金匱之盟”是赵普伪造的，全盘否定此事。除此之外，邓广铭、吴天墀、李裕民、顾吉辰、王瑞来等学者也持同种观点，怀疑它的真实性或断定“金匱之盟”是伪造。

其理由大致如张荫麟所言，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杜太后病重时，宋太祖只有34岁，正值年轻力壮之时，赵光义才23岁，而太祖长子德昭也已经14岁。当时太祖身体健康，没有短寿夭折之象，即使太祖只能再活20年，那时，长子德昭已30多岁，怎么会有幼主之说？杜太后凭什么猜测太祖早死、幼子继位，而宋朝会重蹈五代的覆辙呢？实在没有道理！如果确如太后所预料宋太祖中年夭折，人们还可以推测，也许杜太后凭经验或灵感有超前的洞察力，尚可勉强解释。但是，太祖活了50来岁，并没有早逝而面临幼子主政。如果真有遗诏，太祖临终前应该命人打开金匱，就算是突然死亡，皇后也应该知道此事，掌管金匱的宫人同样也知道此事，为什么要等到太祖死后6年才由赵普揭露出来呢？即使公布遗诏，赵光义应该把全文都公布出来，因为这是他继位合法的有力证据，而留下来的却仅是一个大概的内容，而且内容还不完全一致。更何况，太宗并未遵守遗诏办事，传位给他的弟弟，而是传位给他自己的儿子。

但对“金匱之盟”持肯定观点的学者们提出了相反的证据。关于立此盟约的条件，持肯定论者认为它符合常理。杜太后亲身经历过五代，这是一个王朝更替频繁的特殊时期，五代君主十三人，在位超过十年的绝无仅有，有七人死于非命，杜太后凭什么否认宋太祖可以摆脱“宿命”，而不像周世宗英年早逝、最终幼主执政失国而终呢？杜太后在赵匡胤刚当上皇帝说出了“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取，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这一段话。杜太后认为刚刚建国，根基未稳，随时有可能成为短命的“第六代”。尽管当时太祖正值壮年，但政治变化无常，哪里知道宋太祖不会暴死？哪里知道宋太祖不会被人杀掉？假如真的发生了，10多岁的德昭显然是不足以应付。而拥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赵光义，应是理想的继承人。

“金匱之盟”疑案属于皇家禁宫疑案，否定也好，肯定也好，都是根据当时历史事实、政治背景所作出的判断。比较双方的观点，其资料 and 解释、推断均偏向于对己方所持观点有利的一边，因此越争论疑点越多。

宋孝宗如何夺得皇位

皇帝是古代最有权势的人，所以竞争者有如过江之鲫，但胜利者却寥寥无几。毕竟皇位只有一个，想要从这么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是十分艰难的。

宋孝宗赵昚所使用的手段便是10个貌美如花的处女。作为南宋王朝的第二任皇帝，赵昚并非嫡出，他本来的名字叫做伯琮，不是宋高宗赵构的亲生儿子，而是赵匡胤的后人，是赵匡胤次子赵德芳的六世孙。

自从宋太宗赵光义当上皇帝之后，宋朝的皇帝便没再从赵匡胤的后人中出现过，按道理，赵昚没有机会登上皇位。但从1127年，宋徽宗与宋钦宗困守东京汴梁时，局面才有了

转变。当时刚刚灭掉辽国的金国一鼓作气，攻进了宋朝的首都，将这两个皇帝全部俘虏，同时还抓走了宗室、大臣、后宫妃嫔共计 3000 多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耻”。对于宋王朝来说是耻辱，但对于赵昚来说却是一个机会。

当时侥幸逃过一难的康王赵构在河南商丘登基称帝，创立了南宋，赵构即日后的宋高宗。但宋高宗安稳日子没过几天，就遇到了叛乱，他唯一的儿子在这次叛乱中丧命，而后在建炎二年（1128 年），金兵攻入了宋高宗所在的扬州城，传说当时他正和一名妃嫔温存，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受到惊吓，从此便失去了生育能力。

眼看着香火难以为继，为了保住赵氏江山，宋高宗从赵匡胤后人中千挑万选，选出了一名候选人，即赵昚。为了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宋高宗为赵昚安排了最好的老师，之后在赵昚成年后对他又不断地加封，但就是不肯将他封为太子。因为宋高宗始终不死心，他一直试遍各种偏方，想要生出自己的子嗣，但 20 多年过去了，却是毫无效果，只得把心思放在了赵昚身上。

不立赵昚为太子还有一个原因，宋高宗的母亲韦太后十分喜欢一个名叫赵璩的人。他从小在宫中养大，深得韦太后喜爱，所以韦太后想立他为太子。这令宋高宗十分为难，为了弄清楚这两个人谁才是帝王之才，宋高宗想出了一个测试的办法，他派人挑选了 20 名绝世美女，分别给赵璩和赵昚送去，想测测这两个人的人品和定力。

过了一段时间，当宋高宗将这 20 名美女重新召回的时候，结果出乎意外，他发现送给赵昚的 10 个美女还是处女，而送给赵璩的则已经不是了。通过这件事情，让宋高宗最终立了赵昚为太子。

其实，并非是赵昚的定力好，而是他有一个好老师史浩，此人深谙帝王之心，告诉赵昚千万不要碰这 10 个美女，这很可能关乎他将来一生的前程。听了老师的话，赵昚自然不敢轻举妄动，最后赵昚就这样赢得了宋高宗的青睐。

绍兴三十一年（1161 年）九月，金国再次南下进犯，受到南宋的抵抗后，金军退去。但此时，宋高宗一直奉行的求和政策受到了军民的一致声讨，迫于压力，宋高宗终于将皇位让了出来，赵昚才算正式登上了皇位。

赵昚可以说是南宋一朝最有作为的皇帝，他 36 岁登基，大力重用主战派，积极备战，一心想要收复失地。但可惜那时的南宋早已朝中无人，几次征战相继失败，面对残酷的现实，赵昚不得不放弃收复失地的想法，转而将精力放在内政治理上，他从政治、农业、军事等多个方面同时入手，展开了一系列改革，使得南宋焕发出了难得的生机。

在赵昚的积极治理下，南宋颓废的气象一扫而光，后世将他治理的这段期间称之为“乾淳之治”。国富兵强后，赵昚还是想要收复失地，可惜天不遂人愿，他所看重的大将军虞允文病死四川，此后他手下再也没有能够北伐的大将，于是，赵昚也就一直致力于内政，直到去世。

朱元璋杀刘伯温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刘基，字伯温，心思缜密，足智多谋，是朱元璋夺天下、建明朝的第一谋士。战场上，刘伯温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在许多重要的决策中，他极其准确的判断力起到

了制胜的关键作用。

然而，明朝开国后，刘伯温只得了个次一等的伯爵封号，并且俸禄还是众伯爵之中最低的。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刘伯温最终命丧黄泉，竟与朱元璋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仔细品评个中因由，不难发现，刘伯温那身料事如神的本事，使他在战场上叱咤风云，但在助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同时，也将他推向了生命的终结。

朱元璋是个很重乡土观念的人，而刘伯温却是个外乡人，这在情分上已经有失亲密。何况刘伯温料事如神，对事情的判断往往比朱元璋准确。从龙湾之战到救援安丰，朱元璋能想到的，刘伯温也想到了，而朱元璋想不到的，刘伯温还是想到了。朱元璋本就嫉贤妒能，又岂有如此宽广胸襟，把比他强的人长期留在身边？加之刘伯温的那些计策并非安民之计，而是权谋之策，在政治斗争中更有作用。这更令朱元璋心存猜忌，不仅要防患于未然，更要除之而后快。

刘伯温最致命的失误，验证了“祸从口出”的箴言。朱元璋曾就谁更适合出任丞相一职的问题找刘伯温谈话，言语之中暗藏试探玄机。刘伯温并非等闲之辈，但最终难免“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当朱元璋故作意味深长地说出只有刘伯温能担此大任的时候，刘伯温说道：“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辜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

此话究竟包含了怎样的深意，使得朱元璋自此之后彻底与刘伯温决裂，始终是个难解之谜。或许是朱元璋的偏见，或许是后人的误读，总之它被看成了刘伯温的催命符，为其后来的突然病故埋下了伏笔。

至于刘伯温的死因，同样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谜。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刘伯温生病在家，朱元璋派胡惟庸前往探视，还给他送了补药。刘伯温吃过补药，病情不见好转反而日益严重，不久之后病逝。刘伯温与胡惟庸当时早已是死对头，朱元璋眼看着两虎相争而不动声色，尽显帝王权谋。虽然“下毒谋害刘伯温”也是后来胡惟庸的罪状之一，但以胡惟庸当时的权势和处境实难如此嚣张跋扈，这不得不让人猜想，他是受了朱元璋的默许，甚至这就是朱元璋的本意——借他人之手，除心头大患。

以上种种，也许不过是笼罩在阴霾之下的臆测。事实如何，恐怕再难考量，就留待有心之人的无限遐思吧。

朱棣为何修改正史，否认生母

明成祖朱棣是明朝第三位皇帝，他统治的时期被称为“永乐盛世”。朱棣生于应天，恰逢战乱，被封为燕王，后发动靖难之变，起兵攻打侄儿建文帝，夺位登基。死后庙号“太宗”，一百多年后由明世宗朱厚熜改为“成祖”。

明成祖的生母到底是谁，至今还是个谜。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事实的确如此。关于他的生母是谁，数百年来一直扑朔迷离。

中国古代正妻生的儿子称嫡子，非正妻生的儿子称庶子。正妻被孩子们称为嫡母，其他的妾则被称为庶母。对帝王家来说，嫡子和庶子在名分上有重大差别。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皇帝死后，皇位要由嫡长子继承。即使嫡长子死得早，如果嫡长子有儿子，也要由嫡长子的嫡长子来继承，其他庶子不得觊觎。明成祖自称是马皇后所生，自然也就是所谓嫡子了。但

他的同母弟朱棣却又不是马皇后所生。有学者考证，明成祖的生母并不是马皇后。成祖的生母问题，不只是关系到他的身世，更是深刻地影响到他一生的行为。

有人说朱棣、朱棣的生母是朝鲜人，姓硕。是朝鲜国进贡给朱元璋的妃子，她生下朱棣未足月，即被马皇后折磨而死。“硕”妃生下朱棣一月即死，照此推断朱棣与朱棣为一胎同胞。但是朱棣生于1360年，朱棣生于1361年。朱棣出生之时，朱元璋割据江南，尚未称王，元尚统治北方，刘福通未死，陈友谅、张士诚未灭，怎么会有朝鲜国进贡妃子？所以，此观点并不符史实。

另有一说，朱棣根本不是朱家血脉，而是遗元后代。《黄金史纲》中说大都城破时，元顺帝的妃子弘吉刺氏已经怀孕三个月，没有来得及逃出，躲在一个大瓮中避难。明军搜出后被朱元璋纳为妃子，称为翁（瓮）氏。弘吉刺氏当时心想：“如果七个月后产子，则必然会被朱元璋当做野种杀掉。如果分娩在十个月后则会被朱元璋当做他自己的亲儿子抚养。”于是向天祈祷再添三月孕期。果然怀孕十三个月才分娩，产下一子，就是朱棣。当时朱元璋梦到东西二龙相斗，西龙被东龙打败。解梦的巫师告诉他这代表他的两个儿子争位。西龙是汉后的子孙，而东龙是翁妃的子孙。朱元璋听后认为翁妃来自蒙古，本属自己的敌人，让她的儿子继承大统不好，于是就把朱棣贬去边疆镇守。

然而《明史》上的说法是，朱棣是朱元璋的正妻马氏所生，生于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因为明初朱家皇室娶蒙古人为妃的例子有很多。例如朱元璋就给自己的儿子秦王朱棣娶扩廓铁木尔的女儿为妻。可能朱棣的母亲早死，遂由马氏代为抚养成人。至于这个蒙古皇妃是否以前属于顺帝则大可存疑。

尽管至今仍然不知朱棣生母是谁，但他不是马皇后亲生是大多数人认同的。虽然朱棣反复修改了史书，并消灭了许多证据，但破绽还是存在的。《明史·黄子澄传》中，记载：“子澄曰：周王，燕王之母弟。”从这句话，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一个事实，那就是燕王朱棣和周王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永乐实录》中也记载了他们两个是同母兄弟，但问题在于，他们的亲生母亲是谁？这一谜题还有待细细考证。

明代宗为何死后被冠恶谥

明代宗景泰帝朱祁钰，是明宣宗朱瞻基的次子，明英宗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早年被封为郕王，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土木堡战役之后，明英宗被俘，朱祁钰被迫临危受命，登基称帝。景泰帝在位一共才8年，后因生病，被复辟的英宗废黜软禁而气死，终年30岁。

朱祁钰的一生命途多舛。按照封建等级制度说来，朱祁钰的出身卑贱，因为他的生母只是汉王朱高煦府邸的一位侍女。宣宗皇帝征讨朱高煦时，在返京途中邂逅了吴氏，被吴氏的美貌与聪慧深深打动，于是便将她接回京城。

由于封建礼教的阻挠，身为罪人的吴氏不能被封为妃嫔，于是宣宗将其安排在紧贴宫墙的大宅院中，时常临幸。吴氏为宣宗生下了次子朱祁钰后，被封为贤妃，但继续住在宫外。后宣宗病重，将朱祁钰母子托付给自己的母后张太后，至此朱祁钰才被封为郕王，并在宫外修建王府，与母亲居住。

原本朱祁钰和母亲是可以这样平静地度过一生的，但是土木堡的狼烟却改变了他们的命

运。土木堡战役，英宗御驾亲征，便让郕王朱祁钰担任监国。然而土木堡败讯传来，英宗被俘，举朝大震，群臣聚哭，莫知所措。国家社稷的重任落到监国朱祁钰身上，可朱祁钰却不愿意登基。由于英宗的儿子才两岁，不情愿的朱祁钰就被群臣推上了前台，在孙太后的授意下继承了皇位，即明代宗，遥尊英宗为太上皇，立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太子，年号景泰。

代宗登基与于谦也有关联。早在朱祁钰担任监国时，就爆发了关于“南迁”的争论，翰林院侍讲徐理（即后来参与夺门之变的徐有贞）根据天象的变化首先提出了南迁，这一提议得到了一些胆小的大臣的支持。可是由于祖宗的宗庙和陵寝都在北京，于谦当即否决了他的提议，并得到了朱祁钰的支持。朱祁钰非常欣赏于谦的能力与魄力，于谦也很欣赏眼前这位年轻人的当机立断。紧接着发生的午门血案，更加深了二人的这种感情。

明英宗宠信宦官王振，使得整个朝廷乌烟瘴气，大臣凡是有不利于王振者，非死即贬，群臣的心中早已酝酿着一股洪流。当英宗被俘、王振被杀的消息传来时，群臣的怨气似乎得以倾吐。众大臣跪在午门哭谏，要求朱祁钰惩治王振的党羽，当王振的同党、锦衣卫指挥马顺出来阻挡时，当即被愤怒的群臣打死。见此情形，被吓坏了的朱祁钰唯恐发生哗变，准备逃走，根本就不想登基为帝。这时于谦站了出来，他拉住朱祁钰的衣袖，对他解释大臣们并不是冲着他来的，只要朱祁钰能够惩治王振的党羽，群臣们甘愿辅佐他共创宏图大业。于谦的话让朱祁钰镇定了下来，于是便下令将宫内的两个王振同党带出来交给群臣，这两人也被群臣当场打死，由此可见王振埋下的积怨之深。至此，代宗和于谦之间建立了更深厚的感情。所以代宗登基，于谦应该是推手之一。

但不幸的是代宗当了8年皇帝后突然大病，王振余党曹吉祥等人趁机拥立英宗复位。英宗在天顺二年（1458年）二月，废景泰帝为郕王，将其迁到西宫。不久之后，景泰帝便薨于西宫，年仅30岁。英宗毁其所营建的寿陵，以亲王礼葬于西山。同时英宗还废掉了他的帝号，赐谥号为“戾”，称“郕戾王”。其实这是一个恶谥，表示景泰帝终身为恶，死不悔改。

后来的一些臣子开始为景泰帝平反，认为英宗赐谥号“戾”给代宗是不公的。代宗临危受命，削平惑乱，使老百姓安居乐业，退外敌，迎回英宗，总的说来还是有一番作为的。后来明宪宗下旨恢复景泰帝帝号，但其谥号只有5个字，与明朝其他皇帝17个字的谥号相比，其规格较低，而且还没有庙号。直到南明弘光时期，才给景泰帝加上庙号“代宗”，并增加谥号到17字。至此，景泰帝在礼仪规格上才与明代其他皇帝齐平，他的历史功绩也稍稍为后人所知。

挽救明朝的于谦悲剧收场的真实原因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不缺少力挽狂澜的气质，尤其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候。在明朝就有这么一位从平民阶层走出的硬朗人物。如果不是他在瓦剌部进犯京师的城市保卫战中大喊“主张南迁者，罪当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势便去”，或许明朝的历史就得重新书写了。但是这样的英雄人物也难免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秋，由于蒙古瓦剌部侵犯大明江山，英宗采纳宦官王振的建议，亲自率大军抵抗，由于组织不周且前线指挥由宦官独断，导致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剌军打败，英宗被俘。这时人心惶惶，于谦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坚持“社稷为重，君为轻”

的思想，拥立郕王，九月即帝位，为明景泰帝。使瓦剌挟持英宗迫使大明投降计谋不成，后被于谦大败，明朝取得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

景泰元年（1450年），瓦剌部向大明请和，并归还英宗。八月，明王朝接回英宗，但是一朝不能有两个皇帝，于是英宗就成了“太上皇”，由于英宗的归来，各地政局产生了一些动荡，后都被于谦平定。

景泰八年（1457年），将军石亨、左副都御史徐有贞等发动宫廷政变，拥立英宗重登大宝，就在当天，于谦就被传命逮捕。于谦的罪名是迎立外藩，图谋不轨，罪至当诛。石亨曾是于谦的部下，经于谦提拔才至将军位，在京师保卫战中也曾立过战功，但是此人经常藐视大明律且多行不义，于谦曾就此参劾他，他由此对于谦恨之入骨。徐有贞在京师被围的时候他就是力劝迁都的一派，京师保卫战后景泰帝罢免了他的官职，为此他托于谦替自己向景泰帝求情，无奈景泰帝对他极为反感，复官不成，他就将这笔仇怨记在了于谦头上。

英宗作为这场斗争的直接受害者，在饱经瓦剌被俘之苦归朝后却被封为“太上皇”，但当石亨等人力主要杀于谦的时候，他却公正地说，于谦实有功，“不忍心杀害功在社稷之人”。这时力主要杀于谦的人就把当年其“社稷为重，君为轻”，不顾英宗死活的主张告诉了英宗，甚至还强调：“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意思是，“我们刚刚拥立你做皇帝，必须要肃清朝野，名不正则言不顺，不杀于谦，有谁会承认新皇帝？”这样英宗才痛下决心杀了于谦。

与于谦同被逮捕的王文受刑时为自己辩解，于谦却高声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英宗在下令搜查于谦家的时候才发现，于谦的家里除了打仗用的盔甲和剑器外竟再也没有值钱的东西了。

据史料记载，于谦“死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京郊妇孺，无不泣洒”。石亨、徐有贞等要赶尽杀绝，宦官裴某救于谦的儿子逃过奸党的追杀，还有人不顾个人生死收敛于谦的遗骸。

成化初年，于谦的儿子于冕被赦免，他上疏为父申冤，这才得以恢复于谦的官职和赐祭。皇帝的诰文里说：“当国家多难的时候，保卫社稷使其没有危险，独自坚持公道，被权臣奸臣共同嫉妒。先帝在时已经知道他的冤，而朕实在怜惜他的忠诚。”这诰文在全国各地传颂。弘治二年（1489年），采纳了给事中孙需的意见，赠给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赐在墓建祠堂，题为“旌功”，由地方有关部门年节拜祭。万历中，改谥为忠肃。杭州、河南、山西等地都有祠堂历代奉拜祭祀不止。其实于谦并不需要皇帝的所谓嘉奖，因为这些所谓的天子似乎并没有评价于谦的资格，明英宗之前有过无数的皇帝，在他之后还会有很多，而于谦是独一无二的。

名不见经传的努尔哈赤靠什么脱颖而出

一代英杰努尔哈赤是明末建州女真的首领。他凭借十三副祖传铠甲闯天下，马上征战40余年，于1616年建立后金，即汗位。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努尔哈赤是如何统一建州女真各部落，脱颖而出建立后金政权的呢？

努尔哈赤本出生于建州女真一个贵族家庭里，祖父和父亲都是建州女真的首领，也是明朝封的建州左卫官员。努尔哈赤从小就练习骑马射箭，有一身好武艺。10岁那年，母亲死去，